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一） 之 集 作 著 麟 贺



商務印書館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贺麟 著

商务印书馆

北京·2002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贺麟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ISBN 7-100-03481-7

I. 五… II. 贺… III. 哲学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90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贺 麟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481-7/B · 525

2002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定价: 13.00 元

新 版 序

远在四十年代,我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曾经写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文,收入当时发表的《五十年来的中国》一书中。后来,我在此文的基础上,于一九四五年写成《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时,便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作为第一章,题目改为“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其后各章分别为:第二章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汇;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第四章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此书涉及面很广,包括五十多年来中国哲学的各个方面及其逐步发展的线索。此书于一九四七年在重庆胜利出版公司印行。当时读到此书的人可能不多。近年来有同志问及此书是否再版,他们认为有再版的必要。再版书名改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明确限于从一八八四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之时为起点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这一阶段。全书在不影响原书的体系及主要论点的前提下,作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中第一第二两章除

2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个别字句稍有修订外,尽管有的老一辈哲学家已经去世,有的青年哲学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卓有成绩,我也并没有为他们增加篇幅,未免有遗珠之憾。只有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因为涉及政治问题,且系基于学生的笔记写成,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论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不妥之处,在所难免。

上篇的附录“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一文,是我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哲学》第二辑中发表的“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一文略加修订而成。作为历史性的记述,对于我国哲学界的老前辈止至中年哲学家在建国以前(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作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翻译、介绍、论述,都尽量记载。正好补充了第二章“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汇”,使其相得益彰。

下篇目的在集中深入讨论知行问题,我认为知行合一问题是中国近代哲学界讨论得很多而贡献最大的问题之一。无论程朱与陆王、王阳明与王船山、孙中山与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都对知行合一问题有过重要的贡献,而以《实践论》更为突出。

“知行合一新论”,我于1938年曾在昆明西南联大哲学讨论会上讲演过,并编入《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内。此文似有不少新意思,对于讨论程朱陆王以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和知行合一都有帮助,故置于首篇。

此外各篇总的目的都在于从各方面去说明并论证“《孙文学说》的哲学意义”,特别作了一引言,以概括以下四篇的要旨,归结到《孙文学说》是始于革命实践,经过革命实践的考核,有了他自己丰富的革命知识和经历,特点是他对医学专业锻炼而写成的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哲学学说,称之为《孙文学说》,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末章谈的是“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的曲折发展过程，正好达到了一个全面的总结。——这就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贺 麟

1986年9月

当代中国哲学原序

在中国,特别在八年多抗战时期的中国,不仅是物质方面的交通不便,即精神方面的交通似乎也很不方便,即以中国哲学界而论,有的人著成了书,但迄今没有印行。有的人虽有了书出版,但或因沦陷在上海或香港,无法运来内地,或因在这一城市出版的书刊,销行只限于这一城市附近一带,无法销行到别的城市。又如中国哲学会在抗战前两三年内,每年举行年会一次,宣读论文,讨论问题,颇有自由交换意见、切磋辩难的机会,而在八年来的抗战期中,除了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在昆明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小的年会外,迄今未能举行第二次年会。总之,我们很难有机会彼此互相知道同时代的别的人在哲学方面的努力和成就。

我很欣幸在中国哲学界这样隔阂的情况下,我个人比较多有机会得读中国现时哲学上的许多著作,并得与中国哲学界许多人士晤谈领教。因此出版家要请我写一册《当代中国哲学》,我便欣然应允了。本册里所提到几十位在中国哲学上有

2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贡献的人,除开极少数业已死去的,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其余的人,或是我所亲炙的前辈,或是在北平或昆明的哲学讨论会中,我听过他们的演讲,与他们讨论辩难过哲学问题的同道,或是与我见过面通过信讨论过哲学的朋友。篇中对于他们的哲学思想的叙述,固然表示我对于他们的著作之客观地同情地了解,同时亦即表示我在学问思想上曾受过他们的益处,借这里的篇幅略表我对他们的感谢和敬佩之忱。虽然篇中有几处,我曾对于有几位先生的思想,约略加了几句极简短的批评,这并不表示我对他们缺乏同情的理解和重视,这些批评,只表示我对他们的思想有了批评的兴趣和批评的反应,我相信他们即使不接受我的批评,但至少会有宽容我批评的雅量。

中国传统的著述家有一个错误的、不健全的态度:就是他们对于同时代的人的思想学术,不愿有所批评陈述。他们以为评述同时代的人的著作,容易陷于标榜与诋毁,——标榜那与我感情相得、利害相同的人,诋毁那与我感情不洽、利害相违的人。他们要等着同时代的人死去之后,然后再加评论,这叫做“盖棺论定”。记得有一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朋友——钱穆先生,在他这书中对于那时尚活着的章太炎一字不提,虽然他与章太炎并无私交,而那时章氏年已老迈,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已相当确定。一直到他这书业已出版后,章太炎才逝世。于是他等着章氏逝世以后,方特别著一篇长文,讲述章氏在中国学术上的贡献。这种态度我认为是不妥的,不健全的。第一,这种态度假定著述家评述时人只有标榜与诋毁两途,没有其他合理的持中平正的路途,如同情的了解,客观的欣赏,善意的批评等等,这未免自贬著述家的品格。殊不知,评论时人,抱超然的无关利害的态度虽较之评论古人为

难,却应勉力予以提倡鼓励的。第二,坚执“盖棺论定”之说,亦嫌失之狭隘偏执,因为有许多人未盖棺而论已定。又有许多人已盖棺了千百年,而议论纷纭,犹不能定。若偏执“盖棺论定”之说,误认对于同时代的活着的人,社会上绝无确定的公论,根本否认“舆论”、“时论”的公正性,尤属偏激。且评论之公不公,定不定,须视其评论之出发,是否基于理性,有无证据,决不应以生理方面的死或活为标准。第三,这种不评述时人的著作的态度,大有妨害学术思想的进步。因为一个著作经人评述之后,可以多引起世人的注意,促进学术思想的自由交换流通。而著述者本人经过评述者的批评或鼓励后,也可以使他加以改进和愈益努力。所以评述时人著作,实有鼓舞玉成,使学术空气浓厚并进步的好处。尤其我们应了解著作家的心理,他的著作出版后,他不怕别人的批评或攻击,他最怕的是他的著作如石沉大海,无人理会。所以评论时人的著作,不怕率直无忌,公开批评指斥,而最切戒的,是不写成文字公开评论,而但于背后说长道短,私自发出些偏狭嫉刻、不负责任的诋毁。

我自信本书对于时人的哲学著作,搜罗相当的广,我尤其要感谢北大哲学系教师石峻、任继愈两先生,还有在美国留学的韩裕文先生(他病逝在美国),是他们供给了我不少的材料。但我们所未曾读到的哲学著作,当然还是很多。即就我们所读过的著作而论,我们在本篇中的评述,或亦不免有欠公允、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除表示歉意外,只有希望不久我们中国哲学界也可以采取英美德等国刊行《当代哲学家自述集》的办法,各人自述各人的哲学思想,庶可弥补本书的遗憾了。记得张东荪先生在抗战前即曾提倡过编辑中国当代哲学家的自述集,希望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将来,可以

4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实现。

此外我还须表示一点歉意的,就是中国哲学界有一些人哲学造诣很深,境界很高,讲授哲学成绩很好,但因他们平日不立语言文字,使我们无得而称焉。此外还有许多非哲学界的人士,他们对于哲学的兴趣很浓,见解很好,有时以新颖有趣的思想和文笔,发挥为非专门性的著作,有时他们自己身体力行,发为事功。我们因限于体例,殊以未能略记一笔为歉。又近年来有几个大学哲学系的讲师、助教、研究生,和哲学编译机关的哲学编译人员,很有不少富于哲思和研究兴趣的有希望的人才,我希望十年后有人再写《当代中国哲学》时,他们中有许多人都会占很重要的地位。总之,须知本篇挂漏的地方甚多,读者幸勿以本篇即代表中国当代哲学之全,或误以中国当代哲学即尽于斯矣。

本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是应《五十年来的中国》一书的主编者之约而写的,曾以《五十年来的哲学》为题,首先发表于该书之内。(一九四五年五月,胜利出版社。)兹略加修改补充,列为本书的首篇。此篇实为刊行此册的导端。盖因此篇未能写完,方承编辑者的好意,提议并再三催促我写完此文,另刊单行本的。第二章,“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是特为刊行此单行本而写的,没有在别的地方发表过。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是三年前在青年夏令营的一个演讲,由樊星南君的笔记整理而成的。第四章,“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足以代表中国现代哲学中讨论得最多,对于革命和抗战建国实际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这篇文字指出知行问题,自王阳明以来,直到近十余年,的确有了新的进展和发挥。此文最初曾分五篇发表过。此五篇文字某书店曾印有单行本,但因未得我的允许,且错字太多,纸张太坏,故特略

加增删,收在本书内,作为第四章。就编排的体裁论,是单就知行问题作较深广的论述。但就内容实质说,实本书中最关重要的一篇文章,望读者特别留意。因为我自己觉得这篇文字似乎对于关系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和时代思潮很大的知行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第一,明白指出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不但不冲突,而且互相发明。第二,指出从知难行易说推绎出来的“能知必能行”和“不知亦能行”两原则,较之知难行易说的本身尤为重要,尤为根本且较深于学理基础,较便于指导生活,较能表现近代精神。第三,指出我们还可进一步肯定地说“由知难行易说到知行合一说”的逻辑发展,因为“知难行易说应以知行合一说为基础,不然则理论不坚实;知难行易说应以知行合一说为归宿,不然则理论不透澈”。

1945年8月30日于昆明

目 录

上 篇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	(1)
第二章 西方哲学的绍述与融会	(24)
第三章 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	(62)
一、引言	(62)
二、实验主义或实用主义的剖析	(64)
三、辩证唯物论的剖析	(67)
四、古典哲学的新展望	(74)
附 录 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兼 论我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	(78)

下 篇

第一章 知行合一新论	(130)
第二章 《孙文学说》的哲学意义——引言	(158)
一、对知难行易说各种批评的反批评	(158)
二、孙中山对知难行易说的证明	(170)
1. 据知行的界说以证明	(170)

2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2. 由知识可贵证明知识难能	(173)
3. 由人类文明进化的阶段以证明知难行易	(175)
4. 由人类的分工以证知难行易	(177)
5. 哲学史的证明	(179)
三、知难行易说的绎理	(181)
四、知难行易说的归宿是知行合一说	(190)
第三章 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 孙中山到《实践论》.....	(201)

上 篇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

近五十年来,中国的哲学界即或没有别的可说,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称道的好现象,就是人人都表现出一种热烈的“求知欲”,这种求知欲也就是哲学所要求的“爱智之忱”。我们打开了文化的大门,让西洋的文化思想的各方面汹涌进来。对于我们自己旧的文化,即使不根本加以怀疑破坏的话,至少也得用新方法新观点去加以批评的反省和解释,因而会觉得有无限丰富的宝藏,有待于我们的发掘。尤其足以迫逼着我们,使我们不得不努力探求新知的地方,就是我们处在一崭新的过渡时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信仰均起了空前急剧的变化。其剧变的程度,使许多激烈趋新的人,转瞬便变成迂腐守旧的人;使许多今日之我,不断与昨日之我作战的人,但犹嫌赶不上时代的潮流。我们既不能墨守传统的成法,也不能一味抄袭西洋的方式,迫得我们不得不自求新知,自用思想,日新不已,调整身心,以解答我们的问题,应付我们的危机。因此,这五十年来特别使得国人求知欲强烈的主因,是由于大家认为哲学的知识或思想,不是空疏虚幻的玄想,不是太平盛世的点缀,不是博取科第的工具,不是个人智巧的卖弄,而是应付并调整个人以及民族生活上、文化上、精神上的危机和矛盾的利器。哲学的知识和

2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思想因此便被认为是一种实际力量——一种改革生活、思想和文化上的实际力量。

所以,欲了解我们近几十年来的哲学思想,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推翻传统权威和重新解释哲学思想之处;(二)接受并融会西方哲学思想之处;(三)应用哲学思想以改革社会政治之处。因此本书也分下列四章:(一)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二)西方哲学的绍述与融会;(三)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四)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兹先述第一章。

有许多纯粹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他们没有直接受过西方哲学的训练,然而他们却感受到了西方文化思想的震荡,而思调整并发扬中国哲学以应新时代的需要。他们的心理,分析起来大约有几种不同:有的人对于中国的文教有了宗教的信仰,而认为西方的文化有了危机,想发扬中国文化以拯救西方人的苦恼;有的人,看见西方思想澎湃于中国,中国文化有被推翻被抛弃的危险,抱孤臣孽子保持祖宗产业的苦心,亟思发扬中国哲学,以免为新潮流所冲洗,荡然无存;有的人,表面上攻击西方思想,而不知不觉中却反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还有一些人,表面上虚怀接受西方思想,然而因不明西方思想的根底,他所接受的乃非真正的西方思想,而仍然回复到旧的窠臼。总之,当东方学者与西方哲学初次接触的过渡时代,免不了有种种不彻底的表现。前两种人,思想中本来有新的成分,甚或从守旧眼光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思想,然而他仍说他是直接孔、孟。后两种人,喜欢用他自己也不全懂得的新名词新口号,喜欢作翻案文章,拍出些他们尚未消化的西方某派学说或主义来攻击古人,然而细考其思想言论,他并未能将中国哲学向前推进一步。

大体上讲来,中国哲学在近五十年来是有了进步。这进步的来源,可以说是由于西学的刺激,清末革新运动的勃兴,从佛学的新研究里得到方法的训练,和思想识度的提高与加深。我们试简单地结算一下,至少有了下列几点,可以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一)在这几十年中,陆、王之学得了盛大的发扬;(二)儒、佛的对立,得了新的调整;(三)理学中程、朱与陆、王两派的对立,也得了新的调解;(四)对于中国哲学史有了新的整理。

要叙述最近五十年来从旧传统里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想,似乎不能不从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开始。康氏于五十年前(一八九一),开始讲学于广州长兴里之万木草堂。以一派宗师、思想政治礼教之大改革家自命。综他生平的思想,虽经过激变,由极激烈之改革家,变为极顽固之守旧派。然他生平用力较多,气味较合,前后比较一贯服膺的学派仍是陆、王之学。他在万木草堂时,对于梁任公、陈千秋作学问的方针,仍“教以陆、王心学”。(见梁任公《三十自述》)。平时著书立说,大都本“六经注我”的精神,摭拾经文以发挥他自己主观的意见,他的《新学伪经考》一书,论者称其为“考证学中之陆、王”(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洵属切当。他《大同书》中许多大胆激越的理想,如毁灭家族,公妻共产,破除国界、种界、形界、类界、级界等等主张,也颇与王学末流猖狂的一派相接近,他晚年提出“不忍”为他所独办的刊物之名称,所谓不忍亦与孟子恻隐之心、阳明良知之说较接近。

至于康氏的两个大弟子,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和梁任公思想亦倾向陆、王。嗣同著《仁学》一书,他所谓仁,乃佛之慈悲,耶之博爱,阳明之良知的柔合体。他主张“冲决网罗”,特别注重打破名教礼教世俗的束缚,以恢复仁。象山所谓本心,阳明所谓

4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良知。“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他大声疾呼地反对荀子，尊崇孟子，扬陆、王而抑程、朱。他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他认为惟黄梨洲及王船山二家比较能代表儒家的真面目，因为“黄山于陆、王，陆、王将纘庄之仿佛，王出于周、张，周、张亦缀孟之坠遗”。至于谭氏的性情行径之近似王学中泰州、龙溪一派，更属显然。所以我认为康、谭二人皆以陆、王之学为其中心思想，不过两人皆以气盛，近于粗疏狂放，比较缺乏陆、王之反本心性的精微穷理工夫罢了。

梁任公（一八七三—一九二九）作学问的方面多，思想言论变迁甚速，影响亦甚大，然而他全部思想的主要骨干，仍为陆、王。他最初受学于康有为，所传授者，据他三十自述，系以陆、王之学为主。他也是当时“排荀运动”中一员大将。深感“各派经师二千年内，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清代学术概论》，页138—139）他在湖南时务学堂时，亦以讲陆、王修养论及公羊、孟子民权论为主。他曾选有节本明儒学案，其重心当然在揭示王学的精要。据作者的印象，任公先生谈义理之学的文字，以“五四”运动前后，在《时事新报》发表的几篇谈孟子要旨的文章最为亲切感人。对于“先立乎其大则小者不能夺”之旨，发挥得最透彻。他晚年专注于史学，但在他去世前三两年，我们尚曾读到他一篇斥朱子支离，发挥阳明良知之学的文章。他终身精神发皇，元气淋漓，抱极健康乐观的态度，无论环境如何，均能不忧不惧，不为失望恐怖所侵入。年老而好学弥笃，似亦得力在此。

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为一代国学大师，门弟子遍天下。然而他的哲学思想却没有什人传人，也很少有人注意到。